

“出口—产能假说”与中国企业适用性^{*}

刘 军

内容提要:近年来部分学者指出,不论国内体制是否扭曲,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更愿意在国内销售。本文依据上述观点提出“出口—产能假说”,并探讨和评析了该假说的成因、机理与局限,同时实证研究了其对于中国企业的适用性。结果发现,产能利用率较高(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内销),与“出口—产能假说”相违背,可能原因在于国内存在的内需不足、外需依赖、国企低效和体制扭曲等问题。本文还发现产能利用率是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成因之一,且自身较高的绩效水平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企业的出口选择。本文的研究首次从企业层面揭示了中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其出口决定中的作用,且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抑制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出口—产能假说 产能利用率 出口决定 产能过剩

作者简介:刘 军,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讲师、博士,030006。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6)11-0110-16

一、问题提出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中国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积累的一个日益突出的深层问题(王文甫等,2014)。截至目前,中国已出现数轮大范围的产能过剩,最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危机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导致的中国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大爆发,不仅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而且至今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干春晖等,2015)。为了抑制新一轮的产能过剩,近年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与此同时,此次产能过剩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一方面积极探索产能利用率的有效评价方法,以考察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并对未来的走势进行预测(如韩国高等,2011;Nikiforos,2013);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探究产能过剩形成的特定机理,认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竞争(江飞涛等,2012)、过度干预(王文甫等,2014)、城镇化动因扭曲(刘航、孙早,2014)、官员任期(干春晖等,2015),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韩国高等,2011)、投资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中国服务业 FDI 流入动机及生产率溢出条件:基于微观视角的研究”(15YJC790057);山西财经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我国外资服务企业的 FDI 动机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6036)。

“潮涌”现象(林毅夫等,2010)和市场失灵(Dixon和Rimmer,2011)等是导致产能过剩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政府抑制产能过剩的相关决策体系应考虑上述成因并结合实际进行设计,以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现象。

不可否认,学者们为当前产能过剩矛盾的化解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也构成了本文广泛而深厚的研究基础。但是,已有的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评价指标及形成机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的总体、行业或地区层面,较少涉及微观企业层面,暗含着行业或地区内的企业具有同质性的假设。然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既是产能过剩表现的微观载体,又是产能过剩抑制的执行主体,加之产能过剩行业中并不一定所有企业都拥有较低的产能利用率,而产能不足行业也可能存在产能过剩企业。因此,宏观层面的研究结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政策含义对现实企业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那么,从企业层面来看,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大范围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究竟会做出何种生产和经营决策以应对国内外“失灵”的市场环境,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增强所得政策含义的有效性以及化解当前产能过剩矛盾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Belke, Oeking和Setzer(2015)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内需求大幅萎缩的背景下,通过对五个欧元区国家(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中企业的出口与内销选择的研究,发现国内需求下降导致了企业的产能相对“过剩”,而“过剩”产能带来的损失可能已经超过了向海外市场销售的额外成本,因此这些企业会选择利润相对较低的出口活动,即在海外市场销售产品;而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由于产能约束和边际成本递增,其较难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故会放弃利润较低的海外市场,选择在国内销售。这一结论表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更愿意在国内销售。周瑞辉(2015)进一步指出,在体制扭曲的国家中,由于体制扭曲导致了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采取减少出口以增加内销的策略;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则为了实现要素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倾向于选择出口以消化“过剩”产能。这意味着Belke等(2015)得出的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在出口与内销上的选择行为(即“出口—产能假说”)理论上也存在体制扭曲国家。^①

但是,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虽然国内的体制扭曲的确导致了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相对较低(施炳展等,2013),且产能过剩(不足)企业也表现出较低(较高)的绩效水平,但产能过剩(不足)企业中似乎并未呈现出较强的出口(内销)强度。^②我们不禁要问,“出口—产能假说”适用于中国企业吗?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当前中国抑制新一轮产能过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出口—产能假说”的适用与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若该假说适用于中国企业,意味着国内产能过剩的企业能够通过出口的自我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过剩产能,相应的政策体系应以保障企业的这一自我选择行为作为重点;但若该假说对中国企业不适用,政策体系的设计需在考虑加强该假说适用性的同时,努力寻求促进产能过剩企业出口选择的其他经验路径。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克服传统的关于产能过剩相关研究中企业同质性缺陷的同时,将关注重点置于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对“出口—产能假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与解释,以为当前中国抑制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为适用和有效的微观决策依据。

① 本文将这一观点所述的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在出口与内销上的选择行为定义为“出口—产能假说”。

② 本文对不同产能分组(过剩、正常、欠缺、不足)企业的绩效进行了考察,产能过剩(不足)企业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研发水平、企业规模、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表现出较低(较高)的绩效水平。此外,在四类产能分组企业中,产能利用率越高的分组,其出口企业所占比重越高,即产能过剩(不足)企业中出口企业所占比重是四类产能分组企业中最低(最高)的。

二、“出口—产能假说”:成因、机理与局限

(一)“出口—产能假说”的成因

“出口—产能假说”主要是由传统的内需压力(domestic-demand pressure)假说(Rahmaddi 和 Ichihashi, 2012)演化而来,而内需压力假说主要形成于对出口决定因素的研究中。

20世纪60年代伊始,部分学者发现传统所认为的出口决定因素(如外部需求、成本或价格竞争力)已无法较好地解释一国企业的出口现象(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3)。例如价格竞争力在企业出口中的作用,由于该指数的估计值一般而言较小,这意味着出口量的调整相对于价格变化较为缓慢,特别是在没有灵活汇率作为可用政策工具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Bobeica, Esteves, Rua 和 Staehr, 2015)。因此,其他方面因素(如供给层面的因素)可能在一国企业的出口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国内需求因素,即在国内需求压力可变的条件下,从内需压力视角研究和解释企业在国内销售与海外销售之间的选择。从需求维度来看,国内需求压力的上涨会导致通胀压力增加,进而带来出口价格的相对上升,出口竞争力减弱,企业出口意愿降低;反之,国内需求压力的下降会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相对降低而增强出口意愿(Esteves 和 Rua, 2015)。在供给维度,一方面,商业周期会影响出口企业在各类资源上的可利用程度,进而影响其出口决定,比如,当国内需求压力上涨时,出口企业可能会获得相对更多的国内市场资源,导致其将部分海外销售转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若国内外市场的发展差异较大,企业投资将倾向于更具活力市场中的活动,如国内需求的减少会使得投资更多地以国外市场活动为导向,进而转向出口。此外,在企业产能约束条件下,一国企业的国内销售与海外销售行为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Ahn 和 McQuoid, 2013),即短期内企业的既定产能使得其无法通过重新配置资源来同时满足国内外增加的需求。因此,当国内的需求压力变动时,企业可能会增加(或减少)面向国内的销售而减少(或增加)海外销售。其中,在国内较高需求压力的背景下,企业将满负荷生产,短期内无暇顾及外部需求的增长;相反,当国内经济不景气时,企业能够配置更多的资源去从事出口活动(Esteves 和 Rua, 2015)。换言之,在国内需求下降时期,企业将通过出口选择来弥补其国内销售下降带来的损失;而在需求上涨时期,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主要在国内市场销售,即国内需求压力与企业出口决定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进而形成了内需压力假说。

内需压力假说隐含的内在观点是: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会伴随着国内需求的上涨而提高,而国内需求的下降则会导致企业的产能产生“过剩”(Belke 等, 2015),即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与国内需求压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由内需压力假说可以推演出,在考虑国内需求变动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与其出口决定之间表现为负向关系,即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由于国内需求上涨带来的产能约束,导致其出口意愿较低;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为弥补国内需求下降带来的损失,更倾向于拓展海外市场。上述观点便形成了“出口—产能假说”。但是,由于内需压力假说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研究而得出的,如英国、美国、德国、以色列、土耳其、摩洛哥、欧盟、葡萄牙等,因此,上述所得的“出口—产能假说”可能更适用于体制健全的发达国家。因为,若在体制发生扭曲的国家中,国内需求的上涨或下降可能无法引起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产生一致变动。但是,要素价格扭曲、政府补贴、市场分割等体制扭曲,一方面能够导致企业产生产能过剩现象(周瑞辉, 2015);另一方面,其在降低出口产品价格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张杰等, 2010;施炳展等, 2013)。由于出口价格低于内销价格,使得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采取缩减出口以增加内销的策略来实现利润最

大化,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会通过低价出口化解过剩产能(周瑞辉,2015),这意味着理论上“出口—产能假说”在体制扭曲的国家中也是存在的。

(二)“出口—产能假说”的内在机理

1. 从产能约束视角来看,相对于国内销售,由于存在运输成本、沉没成本或市场转换成本等额外成本,以及拓展海外市场需要在广告、市场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企业选择出口可能面临相对较低的利润(Esteves 和 Rua,2015)。因此,由于产能约束,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在短期内较难同时满足国内外的市场需求,故会放弃利润相对较低的海外市场,而选择在国内市场销售。但是,对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过剩”产能导致的损失可能已经超过了向海外市场销售的额外成本和努力,因此会选择利润相对较低的出口活动在海外市场销售产品。此时,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的出口选择更多地属于“生存驱动型(survival-driven)”出口(Belke 等,2015)。

2. 从边际成本视角来看,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边际成本不变,以能够分别对待国内市场 and 海外市场。但是,在企业生产要素固定的条件下,由于短期内生产要素调整的难度较大或成本较高,现实中的企业大都存在边际成本递增现象(Ahn 和 McQuoid,2013)。例如,当企业短期内较难自由调整资本存量时,常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会导致其边际成本递增;甚至当要素可以灵活调整时,也存在边际成本递增现象(如招聘期较长、加班费支付等)。短期内的边际成本递增使得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面临着出口与内销之间的选择。其中,对于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国内需求的上涨使得初期国内市场的边际收入相对较高,企业的国内销售增加,但在边际成本递增条件下,增加的国内销售导致企业的边际成本上升,在海外市场条件未改变的情况下,企业若仍维持原有的出口量将导致其由于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入而带来损失,此时企业会减少出口,最终的结果是企业的国内销售增加,出口减少;反之,对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国内需求的下降将导致这些企业减少国内销售而增加出口。

3. 从出口产品价格视角来看,当国内体制发生扭曲时,要素价格扭曲、政府补贴和市场分割等体制扭曲导致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使得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国内价格(施炳展等,2013)。在这一事实前提下,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由于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采取减少出口以增加内销的策略,即出口意愿较低;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为了实现要素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倾向于选择出口以通过海外销售化解“过剩”产能(周瑞辉,2015)。

(三)“出口—产能假说”的局限性

1. “出口—产能假说”所主张的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在出口与内销上的选择可能是非对称的。当企业进入海外市场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和更多努力时,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为了消化产能和弥补损失,选择出口并支付海外销售所需的额外成本以及付出更多努力可能是值得的,因而会选择向海外销售产品。但是,之前已经在海外市场上销售产品的部分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为了避免再次支付出口成本,在国外经济条件变得不太有利时(如国外需求下降等),可能也不会轻易退出出口市场而转向国内市场进行销售(Campa,2004)。因此,可能会出现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不会选择内销,即呈现出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都选择出口的非对称现象。

2. “出口—产能假说”主要是由内需压力假说演化而来,而内需压力假说是从供给维度,即国内需求压力视角考察企业在国内需求压力下的内销与出口选择,导致“出口—产能假说”中,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主要反映的是国内的需求压力,即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的需求较大,而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的国内市场需求偏低。但是,现实中部分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其国内需求往往不足,使得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主要是由海外需求决定,即企业

的产能利用率更多地反映出国外的需求压力。在此情况下,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在出口与内销上的选择可能呈现出与“出口—产能假说”的理论预期截然不同的现象。

3. “出口—产能假说”主要解释了一定商业周期内不同产能利用率的企业短期内在出口与内销上的选择,而不是长期效应。^①这是因为,企业产能约束和边际成本递增的内在机制只是在短期内成立。例如,企业在长期通过产能扩张等方式可能不受产能约束的影响而能够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此外,由于存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之间销售转换的沉没成本,以及未来再次进入海外市场的风险成本等,导致在长期可能只有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够克服额外成本,进而选择出口(Belke等,2015)。因此,从长期来看,“出口—产能假说”所主张的观点可能不成立。

4. 体制扭曲下的“出口—产能假说”隐含的观点之一是,国内体制扭曲在导致企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也通过“低价跑量”的出口行为化解了过剩产能(周瑞辉,2015),这意味着体制扭曲国家的产能过剩现象会自行缓解。但是,现实情况确是这些国家的产能过剩大都呈现愈演愈烈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由于体制扭曲下的“出口—产能假说”忽略了需求层面(尤其是国外需求)的因素外,一方面,该假说成立的核心在于出口价格低于内销价格,但体制扭曲不一定导致所有企业的出口价格都降低,如市场分割对外资企业的出口无影响(张杰等,2010),甚至补贴政策提升了外资企业的出口价格(施炳展等,2013);另一方面,即使出口价格低于内销价格,但由于国内的体制已发生扭曲,可能导致企业未表现出市场经济中的求利行为。例如,施炳展等(2013)指出,补贴这一扭曲体制的行为,虽然总体上促成了中国企业“低价竞争、数量取胜”的出口模式,但主要是通过提升降价空间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出口,使其以低价形式将补贴转移至国外消费者,而国有企业却将补贴转化为利润以增强其国内的垄断力量,即选择出口的意愿较低。由于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相对较高的产能利用率,^②故上述结论表明,在补贴带来的体制扭曲条件下,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更愿意在国内销售,这与“出口—产能假说”的观点截然不同。

三、经验研究设计: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经验模型构建

目前关于异质性企业出口决定的经验研究中,多数学者将因变量设为企业是否出口的二元变量。为此,本文也将因变量设为二元变量,并采取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经验模型构建如下:

$$export_{it} = \alpha_{it} + \beta_{it}caputil_{it} + \vec{\lambda}factor_{it} + \vec{\gamma}control_{it}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export_{it}$ 是二元变量,赋值标准为:若是出口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 $caputil_{it}$ 是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factor_{it}$ 代表影响企业出口决定的一系列因素,包括自身因素($infactor_{it}$)和外部不确定因素的自身因素($outfactor_{it}$); $control_{it}$ 是行业、地区等异质性特征的控制变量; ϵ_{it} 是不可观测因素,其由持续的企业特定因素(μ_{it})和随机的短暂因素(η_{it})组成。由 $export_{it}$ 的二元变量性质,可以得出企业的最优出口决定的动态方程,具体为:

① “出口—产能假说”所反映的短期效应主要体现在体制健全国家,在体制扭曲的国家中,该假说的内在机理表明,只要国内的出口价格低于内销价格,其在长短期内都是存在的。

② 见后文的图2,各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大都高于国有企业。

$$export_{it} = \begin{cases} 0 & \text{if } \alpha_{it} + \beta_{it}caputil_{it} + \vec{\lambda}factor_{it} + \vec{\gamma}control_{it} + \mu_i + \eta_{it} \leq 0 \\ 1 & \text{if } \alpha_{it} + \beta_{it}caputil_{it} + \vec{\lambda}factor_{it} + \vec{\gamma}control_{it} + \mu_i + \eta_{it} > 0 \end{cases} \quad (2)$$

由于存在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会由于内生性偏误而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模型中组内方差带来的内生性偏误一般可通过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估计进行克服(易靖韬,2009),因此,本文借鉴赵伟等(2011)和易靖韬(2009)等的思路,对残差的协方差进行约束:

$$\begin{cases} cov(caputil_{it}, \mu_i) = cov(factor_{it}, \mu_i) = cov(control_{it}, \mu_i) = 0 \\ cov(\mu_i, \eta_{it}) = 0 \end{cases} \quad \forall i, t \quad (3)$$

根据(3)式,本文接下来将采取随机效应 probit 模型对(2)式进行估计。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export_{it}$)与主要自变量($caputil_{it}$)。首先,在是否为出口企业的界定标准上,本文根据出口交货值是否为零进行界定,若企业的出口交货值等于零,则认为该企业为非出口企业,对 $export_{it}$ 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此外,本文还将采取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是否高于某一临界值对出口企业重新进行界定,以排除那部分出口相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可能带来的“异质”影响,同时考察出口企业界定标准的改变是否会实质性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其次,产能利用率($caputil_{it}$)采取企业实际产出与其现有条件下利用全部资源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之比进行衡量。

2. 企业自身因素($infactor_{it}$)。纵观已有的关于异质性企业出口决定的经验研究成果,企业的生产率、年龄、规模和资本密集度等自身因素显著地影响着其出口决定(易靖韬,2009)。因此,本文也选取企业的生产率(tfp_{it})、年龄(age_{it})、规模($size_{it}$)和资本密集度(kl_{it})等四个企业自身因素变量纳入模型中,以考察自身因素影响企业出口决定的现实效应。此外,李坤望等(2015)在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框架下,发现信息化是企业出口决定比较优势的一个新来源,信息化密度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同时,企业较高的研发水平意味着其能够更为有效地克服国外市场存在的技术壁垒和提高产品的多样性。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纳入企业的信息化水平($inform_{it}$)和研发水平(rd_{it})变量。

3. 外部不确定因素($outfactor_{it}$)。企业的出口决定除了受自身因素的影响外,外部不确定因素也在其出口决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已有研究来看,多数学者较为关注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机理及效应。鉴于此,本文也将企业面临的外部金融环境因素纳入,构建金融支持变量($finance_{it}$)。此外,考虑到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贸环境和政企关系也可能对其出口决定产生影响,本文分别构建贸易便利性变量($trade_{it}$)和政企关系变量($relation_{it}$)进行考察。

4. 控制变量($control_{it}$)。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一方面,在体制扭曲的国家中,“出口—产能假说”可能由于企业的所有制(国有、民营、外资等)不同而对其适用性带来影响,为此本文通过将企业的所有制虚拟变量(dum_own)纳入,以控制企业的所有制差异对其出口决定带来影响;另一方面,需求压力、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等其他外部因素也可能影响“出口—产能假说”的适用性,即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为了避免因遗漏上述重要自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行业虚拟变量(dum_ind)、地区虚拟变量(dum_reg)和年度虚拟变量(dum_year)纳入模型中,以分别控制来自行业、地区和年度等方面的外部冲击。

(三)经验样本与数据说明

在经验检验所需的样本上,本文选取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公布的2005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作为经验检验的样本。该样本涵盖范围较广,涉及国内绝大部分地区和制造业行业。因为该数据库是世界银行在中国的30个省(市)(西藏除外)的120个城市中,随机选取部分企业进行

调查汇总而成,共涉及 30 个制造业行业的 12400 家企业前三年(2002—2004 年)的生产经营状况。因此,采取该样本所得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般适用性。同时,世界银行企业调查小组针对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还直接给出了企业的实际产出与其现有条件下利用全部资源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之比,即产能利用率指标,避免了该指标测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误。

结合各变量衡量所需数据和样本企业的调查指标,各变量的衡量方法及其数据说明如下。

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数据以及后文界定出口企业所需的出口额占销售额比重数据直接采取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公布的相应指标。在企业生产率的测算上,考虑到生产率测算过程中的同时性和选择性偏差、相关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样本的损失程度,本文采取 LP 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进行衡量,所需的企业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的衡量方面,分别采取样本中公布的企业销售收入、机器与设备年末的账面净值、雇员人数以及经营管理成本进行衡量。同时,分别采取《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指数(均以 2005 年为基期)对各企业的销售收入、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进行平减。企业资本密集度采取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之比进行衡量,其中,资本投入采取剔除价格因素后的机器与设备年末的账面净值衡量;劳动投入采取雇员人数进行衡量。企业规模采用企业的雇员人数衡量。企业年龄采取企业调查样本中的样本数据年份减去企业开始经营年份再加 1 年。企业信息化水平采取企业调查样本中公布的企业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投资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进行衡量。企业研发水平采取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给出的企业研发支出额进行衡量。此外,为了降低各变量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以及较强的变动幅度对检验结果带来的影响,除产能利用率和信息化水平两个百分比形式的变量外,本文对上述其他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

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变量的衡量上,企业面临的金融支持变量采取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公布的企业是否享有金融机构优惠的透资额度或贷款条件虚拟变量进行衡量。若企业享有金融机构给予的相关优惠,说明金融支持力度对该企业而言相对较大,此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关于贸易便利性变量的衡量,本文采取企业出口清关所需天数进行衡量,但由于只有出口企业才公布了该指标数据,本文结合样本企业所在城市,计算出各城市中出口企业的平均出口清关所需天数以反映企业的贸易便利性。政企关系变量采取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公布的企业是否有专人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这一虚拟变量进行衡量。

在控制变量的衡量上,首先,本文根据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给出的各样本企业的所有制信息(国有、私营、外资和其他企业)生成所有制虚拟变量;其次,根据样本企业所在的行业和样本数据年份,分别生成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最后,在地区的虚拟变量设定上,本文根据样本企业所在的 120 个城市信息,将各样本企业归类为 30 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然后生成样本企业所在省份的地区虚拟变量。

四、“出口—产能假说”的适用性:现实表现及原因透析

(一)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特征事实

为了能够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有一个初步认识,本文首先采取样本数据考察和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图 1 给出了 29 个制造业行业中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可以看出,除了烟草制品业(4)之外,其他制造业行业中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高于非出口企业,这一特征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出口—产能假说”可能不适用于中国企业,当然,上述现象

也可能是由于企业选择出口之后带来了较高的产能利用率。此外,烟草制品业中非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出口企业的主要原因是,该行业拥有政府经营特许权,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加之该行业中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成本和风险较高,受海外市场因素的影响较难提升产能利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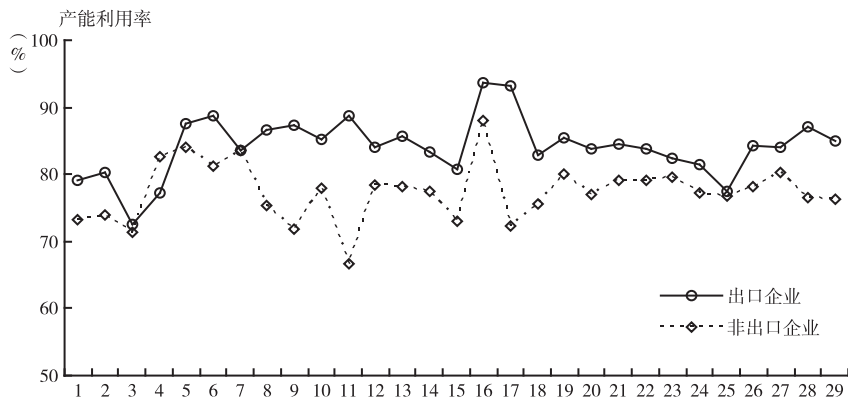


图1 出口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注:行业(1)~(29)是对应的样本企业所在的29个制造业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整理。

(二)经验检验结果及分析

1.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首先,本文采取基准模型进行估计,且为了考察模型中不可观测因素的重要性,估计过程中将分别基于probit模型和xt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估计结果来看,xtprobit模型中的似然比检验(原假设: $\rho=0$)结果的P值为0,即拒绝了原假设,意味着模型中组内方差较为重要,无法忽略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影响。但是,从probit模型和xt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说明在基准模型中,较为重要的不可观测因素未对估计结果带来较大影响。

根据probit模型和xtprobit模型报告的估计结果,首先,在产能利用率方面, $caputil$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更愿意选择在国内销售,即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不会自我选择出口以消化“过剩”产能,这与“出口—产能假说”相违背。

其次,在企业自身因素上, $lnfp$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可能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大量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是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戴觅等,2014)。 $lnage$ 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主要是由于中国早期国有企业对外贸经营权的垄断,以及20世纪末外贸经营权的下放和期间的改革,导致较有经验的“老”企业和较为年轻的“新”企业都具有较高的出口倾向(赵伟等,2011)。 $lnsize$ 和 $lnkl$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表明规模越大或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事出口活动,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赵伟等,2011)。 $inform$ 显著为正的系数估计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出口倾向,与李坤望等(2015)针对中国企业的研究结论是相同的。 $lnrd$ 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研发水平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出口,主要是因为研发水平较高的企业,一方面可以更为有效地克服国外市场存在的较高技术壁垒;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原有产品的质量及多样性,同时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进而提升了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选择出口的倾向增强。

最后,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上,采取企业面临的出口清关所需平均天数衡量的贸易便利性变量(*trade*),其系数符号显著为负,表明若企业面临较长的出口清关天数,其更愿意选择国内销售,反映出贸易便利性是影响企业出口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推行提高贸易便利性的“大通关”模式是促进企业出口的一个有效方式。*finance*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力度较大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即金融约束会对企业的出口决定起到制约作用(Manova,2013)。*relation*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良好的政企关系能够促进企业从事出口活动,也反映出良好的政企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需要重点关注和处理好的一个关键方面。

表 1 基准模型及克服内生性之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	基准模型		克服内生性	
	probit	xtprobit	iv-probit	iv-xtprobit
<i>caputil</i>	0.002*** (4.726)	0.004*** (3.263)	0.034*** (7.563)	0.156*** (2.918)
<i>ln_{tfp}</i>	-0.007 (-0.714)	-0.012 (-0.388)	-0.251 (-1.409)	-0.001 (-0.347)
<i>lnage</i>	-0.011 (-1.215)	-0.012 (-0.437)	-0.041*** (-2.955)	-0.010 (-0.373)
<i>lnkl</i>	0.048*** (7.758)	0.160*** (8.682)	0.028 (1.518)	0.150*** (7.931)
<i>lnsize</i>	0.314*** (44.744)	0.936*** (39.034)	0.177*** (5.777)	0.935*** (38.939)
<i>inform</i>	0.021*** (7.947)	0.065*** (8.456)	0.013*** (4.109)	0.066*** (8.682)
<i>lnrd</i>	0.059*** (21.450)	0.163*** (19.917)	0.047*** (9.668)	0.161*** (19.356)
<i>trade</i>	-0.040*** (-9.037)	-0.123*** (-9.092)	-0.030*** (-3.895)	-0.124*** (-9.189)
<i>finance</i>	0.215*** (12.010)	0.707*** (13.618)	0.175*** (6.434)	0.701*** (13.467)
<i>relation</i>	0.105*** (5.945)	0.332*** (6.348)	0.095*** (5.709)	0.320*** (6.129)
常数项	-2.797*** (-32.582)	-8.391*** (-30.191)	-3.232*** (-4.749)	-8.137*** (-32.430)
<i>dum_own</i>	Y	Y	Y	Y
<i>dum_ind</i>	Y	Y	Y	Y
<i>dum_reg</i>	Y	Y	Y	Y
<i>dum_year</i>	Y	Y	Y	Y
rho=0(Wald 外生性检验)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36951	36951	36946	37055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probit和iv-probit的估计结果中,报告的是采取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纠正后的统计量;rho=0为似然比检验的原假设,表中给出了检验结果的P值,其中iv-probit中报告的是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Wald外生性检验结果。下表同。

2. 内生性问题处理。前文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可能由于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而产生偏差,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出口决定与其产能利用率和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为此,本文需要寻找到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工具变量。其中,在生产率的工具变量选取上,本文选取拥有高中学历以上雇员的比重作为生产率的工具变量。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工具变量选取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是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动的最为直接的因素(韩国高等,2011),一般而言,企业当年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基于目前的产能不足,故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越高的企业,其面临着相对越高的产能利用率。但是,本文在构造了这一连续工具变量之后,发现样本中当年未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所占比重达到32%。为此,为了进一步规避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新增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这一连续变量设定为类别变量。具体而言,若企业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大于(等于)零,则赋值为1(0)。同时,考虑到上述赋值标准的改变可能会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带来实质性影响,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将改变工具变量的赋值标准,即若企业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大于5%(或10%),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表1报告了采取工具变量之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iv-probit模型中Wald外生性检验的P值为零,说明本文所采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但从iv-xtprobit模型中似然比检验结果为零的P值来看,仍然无法忽略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影响。因此,根据iv-xt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更为可靠。从iv-xt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采取工具变量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主要自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变化,表明在选择xtprobit模型缓解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之后,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未对估计结果带来较大偏差,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出口—产能假说”对于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

(三)经验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1. 因变量测度改变。本文首先改变出口企业的界定标准,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新的界定标准为:若企业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大于等于(小于)5%,则认定该企业为出口(非出口)企业。估计结果见表2的(1)列,可以看出,除 $lnfp$ 的系数显著性大幅提高之外,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lnfp$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说明“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仍存在,但也反映出那部分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小于5%的企业拥有着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进一步证实了出口规模较大但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加工贸易企业是导致中国呈现“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的原因之一。

2. 估计方法改变。为了验证估计方法的改变是否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进一步采取xtlogit模型进行估计,且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所带来的偏差,采取工具变量法运用iv-xtlog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的(2)列。根据估计结果,主要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不会因估计方法的改变而变化,前文所得结论是可靠的。

3. 工具变量赋值标准改变。前文已经提到,本文将通过改变产能利用率的工具变量的赋值标准,以验证赋值标准的改变是否会对工具变量有效性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前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表2的(3)列给出了以企业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所占比重是否大于5%为界定标准所得产能利用率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①可以看出,工具变量赋值标准改变之后,主要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符

^① 限于篇幅,表2中未给出以企业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所占比重是否大于10%为界定标准所得产能利用率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号与表 1 的 iv-xt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 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且从 Wald 外生性检验结果来看, P 值为零也说明新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 前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4. 异常样本剔除。在前文数据处理的过程中, 已经剔除了各类数据中的异常值。但是, 由于 TFP 是测算所得, 在测算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可观测的误差, 导致部分企业的 TFP 值为离群值。为此, 本文将剔除上述 TFP“异常”的样本, 具体方法为: 剔除 TFP 值低于 5% 分位数值和高于 95% 分位数值“异常”样本企业。异常样本剔除之后的“新”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 2 的(4)列。根据“新”样本的估计结果, 主要自变量和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 剔除“异常”样本之后的估计结果仍是较为稳健的, 说明本文所得结论是可信的。

5. 估计样本细分。Belke 等(2015)指出, 只有在产能利用率处于极端水平(过高或过低)的企业中, 才可能会呈现出显著的出口与内销之间的选择效应。鉴于此, 本文进一步根据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对样本企业进行细分。在细分标准上, 借鉴韩国高等(2011)所采取的欧美等国家通过产能利用率判定企业所处产能状况的标准, 即若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 79%, 则认为其为产能过剩企业; 若产能利用率高于 90%, 则判定为产能不足企业。本文采取上述标准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之后, 分别对产能过剩企业(样本 1)和产能不足企业(样本 2)这两个产能利用率处于极端水平的样本企业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2, 其中(5)列是样本 1 的估计结果; (6)列是样本 2 的估计结果。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caputil</i>	0.177*** (7.364)	0.580*** (3.704)	0.090** (2.450)	0.181*** (3.454)	0.246*** (3.111)	0.138*** (3.117)
<i>ln_ttfp</i>	-0.002*** (-4.722)	-0.003 (-0.760)	-0.001 (-0.314)	-0.001 (-0.594)	0.004** (2.395)	-0.002*** (-2.993)
<i>lnage</i>	-0.025* (-1.879)	-0.150 (-1.376)	-0.006 (-0.204)	-0.010 (-0.355)	-0.012 (-0.280)	-0.050** (-2.135)
<i>lnkl</i>	0.063*** (7.784)	0.290*** (4.921)	0.152*** (8.106)	0.160*** (8.369)	0.143***	0.108*** (7.388)
<i>lnsize</i>	0.522*** (56.440)	2.170*** (31.443)	0.941*** (39.051)	0.998*** (43.433)	0.825*** (23.611)	0.715*** (43.004)
<i>inform</i>	0.045*** (12.574)	0.134*** (2.737)	0.064*** (8.202)	0.068*** (8.653)	0.070*** (5.940)	0.041*** (6.540)
<i>lnrd</i>	0.049*** (13.005)	0.326*** (10.459)	0.162*** (19.430)	0.161*** (20.099)	0.159*** (12.426)	0.118*** (18.301)
<i>trade</i>	-0.075*** (-12.796)	-0.302*** (-6.794)	-0.124*** (-9.142)	-0.116*** (-8.773)	-0.085*** (-4.061)	-0.102*** (-9.738)
<i>finance</i>	0.349*** (14.355)	1.753*** (8.823)	0.703*** (13.434)	0.629*** (12.394)	0.703*** (8.762)	0.537*** (12.801)
<i>relation</i>	0.318*** (13.432)	0.918*** (5.253)	0.320*** (6.099)	0.308*** (6.031)	0.180** (2.273)	0.386*** (9.154)

续表 2

	(1)	(2)	(3)	(4)	(5)	(6)
常数项	-4.817*** (-48.098)	-13.946*** (-16.464)	-8.145*** (-32.260)	-8.696*** (-36.110)	-7.850*** (-21.266)	-5.873*** (-31.273)
<i>dum_own</i>	Y	Y	Y	Y	Y	Y
<i>dum_ind</i>	Y	Y	Y	Y	Y	Y
<i>dum_reg</i>	Y	Y	Y	Y	Y	Y
<i>dum_year</i>	Y	Y	Y	Y	Y	Y
rho=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Wald 外生性检验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37055	37055	37055	33253	13852	12655

注：表中给出的是采取 iv-xt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iv-provit 模型下各类稳健性检验结果未给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根据估计结果，除生产率变量和样本 2 中的企业年龄变量外，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与总体层面相比，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尤其是产能利用率变量，在两个子样本中的系数符号都显著为正，表明“出口—产能假说”的确是不适用于中国企业的，本文所得结论是真实可靠的。对于生产率变量，其在子样本 1 中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而在子样本 2 的则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产能过剩企业中，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在产能不足企业中，倾向于选择出口的却是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同时也表明，除加工贸易企业外，产能利用率也是中国“出口—生产率悖论”出现的成因之一，验证了周瑞辉(2015)的理论观点。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若企业的产能产生过剩，过剩产能造成的损失使得只有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才能克服海外销售的额外成本而选择出口；与此同时，加入 WTO 带来的海外需求急剧扩大可能导致较为年轻的加工贸易企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产能利用率提高，甚至出现产能不足现象，但由于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且较为年轻，使得样本期内呈现出生产率较低、年龄较小的企业倾向于出口的现象。当然，产能不足企业中那部分产能利用率位于“顶端”的企业，国内较高的需求以及产能约束使得其也不会选择支付额外成本向海外市场销售产品。

(四)内在原因剖析

前文针对中国企业的适用性研究结论与“出口—产能假说”的观点截然不同，可能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从需求视角来看，内需不足和外需依赖可能导致了国内企业在出口与内销上的选择行为有悖于“出口—产能假说”。一方面，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不足、人均收入低下、城乡二元体制等国内现存现象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等问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国内企业对国外需求的依赖程度较高。内需不足和外需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更多地是由国外需求决定。例如，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至今仍处于低迷状态，这成为了中国产生新一轮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上述国外需求在国内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上起主要作用的现象与“出口—产能假说”所主张的国内需求决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假设相违背，进而使得由国外需求下降带来的产能“过剩”的企业不会选择出口，而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由于国外需求压力较大，加之其能够有效地克服出口沉没成本，故会选择海外销售。

2. 从企业性质视角来看,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之国有企业改革的渐进式道路可能是致使“出口—产能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的原因之一。2004年之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历经了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两大阶段,但此时的改革还未触及深层次内容,国有企业仍然对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较高。与此同时,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拥有较低的产能利用率(见图2),加之对国内市场的高度垄断导致其付出更多努力拓展海外市场的意愿较低。因此,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对国内市场的高度垄断以及开拓新市场的消极意愿,迫使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的民营企业更多地选择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进而呈现出中国企业的现实表现与“出口—产能假说”不一致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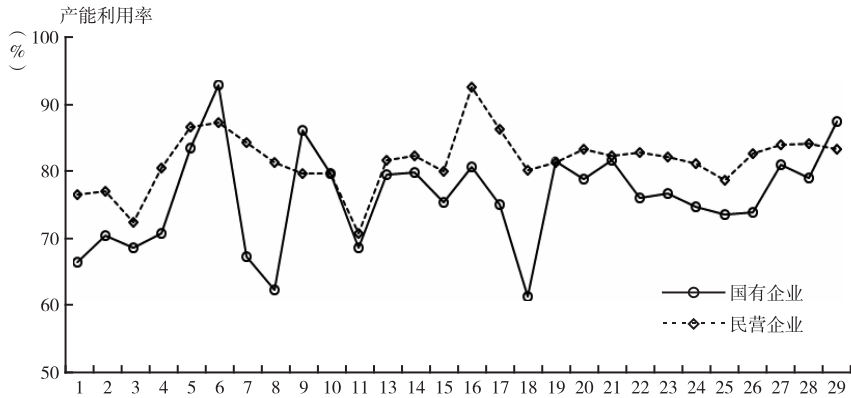


图2 各行业国有及民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注:行业(1)~(29)是对应的样本企业所在的29个制造业行业;行业(12)中无国有企业样本,故删除该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整理。

3. 从体制视角来看,国内体制扭曲导致企业表现出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可能是得出与“出口—产能假说”不一致结论的一个重要因素。体制扭曲下的“出口—产能假说”认为在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内销价格较低时,为了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要素及机会成本最小化),产能利用率较高(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内销(出口)。但该假说忽略了在体制发生扭曲的现实经济中,企业的经营动机可能已经不再是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即表现出一定的非求利行为。具体至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和出口补贴主要通过提升降价空间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出口,将国内“生产要素应得”和补贴所得通过低价出口形式转移给了国外消费者,同时加强了未选择出口的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施炳展等,2013);同时,国内市场分割会导致中国本土企业中创新能力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通过将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化为出口比较优势而被迫从事出口活动(张杰等,2010),考虑到国有企业较低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市场分割更多的是将民营企业挤到了出口市场。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出口补贴和市场分割等体制扭曲使得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发生了扭曲,进而呈现出产能利用率较高(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内销)的现象。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探讨“出口—产能假说”的成因与机理以及评析其局限性的基础上,采取世界银行提供

的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经验检验了该假说对于中国企业的适用性,并进一步剖析了中国企业现实表现的内在深层原因。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口—产能假说”不适用于中国企业。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更愿意选择内销,即倾向于在国内销售。这一结论在采取工具变量克服模型内生性之后仍然成立,且分别从多维度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该结论是可靠的,表明“出口—产能假说”对于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

第二,内需不足、外需依赖、国企低效和体制扭曲可能是“出口—产能假说”对于中国企业不成立的内在原因。内需不足和外需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更多地是由国外需求决定,这与“出口—产能假说”所主张的国内需求决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观点相违背;国有企业及其渐进式改革的现状,使得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较高,开拓新市场的意愿较为消极,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出口补贴和市场分割等体制扭曲更多地推动了民营企业通过低价形式出口,而国有企业则加强了其国内的垄断地位。

第三,除了产能利用率外,本文还发现自身较高的绩效水平和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促进企业选择进入海外市场。总体及子样本(产能过剩及产能不足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信息化水平或研发水平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且贸易便利性、金融支持和良好政企关系等外部环境在企业的出口决定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生产率对其出口决定的作用存在不一致现象,其中,总体层面上生产率在中国企业的出口决定中的作用不显著,即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但子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在产能过剩企业中,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产能不足的企业中倾向于选择出口的却是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产能利用率是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出现的原因之一。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再次陷入产能过剩困境,在此背景下,上述基于微观视角的针对“出口—产能假说”对于中国企业的适用性研究结论,为我们提供了通过产能过剩企业的出口选择化解部分过剩产能的相关对策。这些对策不仅包括宏观市场及体制层面的加强“出口—产能假说”对于中国企业适用性的相关政策建议,也涉及微观企业层面的促进产能过剩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的相关措施。

在加强“出口—产能假说”对于中国企业的适用性方面,该假说在中国适用性的增强意味着产能过剩企业能够通过出口选择缓解自身的产能过剩压力,但根据前文分析结论,内需不足、外需依赖、国企低效和体制扭曲等导致了目前该假说不适用于中国企业。因此,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比重;积极推动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消除行业垄断利润等,以破解国民消费不足的局面。与此同时,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通过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以改善国内投资结构,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二是随着国内劳动力优势的逐步丧失,通过挖掘其他资源优势,升级资源禀赋,同时充分利用和协调国内各地区资源,达到资源利用和配置的最优化,进而降低对国外需求的依赖程度。三是改变之前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重视和扶持,同时,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及人事改革深化和落实至基层实践中,通过资产拍卖、人员分流等形式将产能严重过剩的国有企业中的部分“过剩”的劳动力和资产进行转移和置换。此外,降低国有企业垄断程度较高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性,以调动其拓展海外市场的积极性。第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制度,矫正现有不合理制度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充分发挥市场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均衡、淘汰落后企业和产能等方面的高效率性(江飞涛

等,2012)。

在促进产能过剩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方面,前文研究表明,对于产能过剩企业,自身较高的绩效水平和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促进其选择出口,进而消化过剩产能。然而,相对于其他企业,目前的产能过剩企业,尤其是内销企业拥有较低的绩效水平和较差的外部环境。因此,若要通过产能过剩的内销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行为化解过剩产能,一方面,就企业自身而言,产能过剩企业需加大自身的研发投入或引进先进技术的力度,并引进相关人才,防止人才流失,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以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生产率水平,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同时,产能过剩企业也需要重视信息化水平建设,提高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充分利用国内外的现代行业信息平台获取资讯。但是,鉴于产能过剩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对较低,难以加大资本投入来提高自身的绩效水平,政府应对产能过剩企业在研发投入、技术引进、人才培养、员工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倾斜。另一方面,在继续推进便捷高效的“大通关”模式的基础上,赋予产能过剩企业在出口报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优先权利,为产能过剩企业营造良好贸易环境的同时,降低其出口成本。同时,政府也需引导金融机构在放贷、利率等方面给予产能过剩企业优先和优惠的政策,改善其面临的金融支持环境。当然,政府也需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在抑制产能过剩过程中主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避免对产能过剩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更多地行使服务职能,以通过改善政企关系促进企业出口。

参考文献:

- 戴觅、余淼杰、Maitra, M.:《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2期。
- 江飞涛、耿强、吕大国、李晓萍:《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6期。
- 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齐鹏飞、王晓妹:《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 干春晖、邹俊、王健:《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3期。
- 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 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管理世界》2015年第4期。
- 刘航、孙早:《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1期。
- 施炳展、逯建、王有鑫:《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数量还是价格?》,《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4期。
- 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管理世界》2014年第10期。
- 易靖韬:《企业异质性、市场进入成本、技术溢出效应与出口参与决定》,《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 周瑞辉:《体制扭曲的产能出口门限假说:以产能利用率为门限值》,《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 赵伟、赵金亮、韩媛媛:《异质性、沉没成本与中国企业出口决定》,《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
- 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 Ahn, J. B., & McQuoid, A. F., Capacity Constrained Exporters: Micro Evidence and Macro Implications. Econpapers Working Paper, No. 1301, 2013.
- Belke, A., Oeking, A., & Setzer, R., Domestic Demand, Capacity Constraints and Exporting Dynamic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Vulnerable Euro Area Coun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Vol. 48, 2015, pp. 315—325.
- Bobeica, E., Esteves, P. S., Rua, A., & Staehr, K., Exports and Domestic Demand Pressure: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for the Euro Area Countries. ECB Working Paper, No. 1777, 2015.
- Campa, J.,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How Important is Hysteresis in Trad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8, No. 3, 2004, pp. 527—548.
- Dixon, P. B., & Rimmer, M. T., You Can't Have a CGE Recession without Excess Capacity. *Economic Modelling*, Vol. 28, No. 1—2, 2011, pp. 602—613.
- Esteves, P. S., & Rua, A., Is There A Role for Domestic Demand Pressure on Export Performance? *Empirical Economics*, Vol. 49, No. 4, 2015, pp. 1173—1189.

20. Manova, K. , Credit Constraints,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80, No. 4, 2013, pp. 711—744.
21. Nikiforos, M. , The (Normal) Rate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at the Firm Level. *Metroeconomica*, Vol. 64, No. 3, 2013, pp. 513—538.
2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External Rebalancing in the Euro Area*.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3, pp. 45—48.
23. Rahmaddi, R. , & Ichihashi, M. , How Do Foreign and Domestic Demand Affect Exports Performance? An Econometric Investigation of Indonesia's Exports. *Modern Economy*, Vol. 3, No. 1, 2012, pp. 32—42.

“Export-Capacity Hypothesis” and Its Applicability for Chinese Firms

LIU Ju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03000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me studies show that the enterprises who have higher (lower) capacity utilization will choose domestic sales (export), and this also exists even in the countries with distorted system. The above viewpoint is defined “Export-Capacity Hypothesis (ECH)” in this paper,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CH for Chinese firms is analyzed empiricall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ECH’s causes, mechanisms and limit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lower) capacity utilization tend to become exporters (domestic sellers)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ECH. The causes may be lack of domestic demand, higher dependence of foreign demand, inefficient of state owned-enterprises and distorted system. Besides, it also find that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one of the causes of Chinese firms’ “productivity paradox”, and the enterprises’ higher performance and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its export selection. This study firstly reveals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ole in the export selection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nd the above results could provide the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hina’s the policy-making in suppressing current excess capacity.

Keywords: Export-Capacity Hypothesis, Capacity Utilization, Export Decision, Excess Capacity

JEL:D21, D24, F10

责任编辑:原 宏